

# 六朝文化研究刍议

胡阿祥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南方六朝即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具有一贯性相共通的特点,适合作为一个研究单元。当此六朝文化研讨及其开发应用越来越得到学界重视、政府支持、社会关心乃至引起“地域文化资源争夺”<sup>[1]</sup>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立足于宏观的层面,厘清相关概念,明确时代特征与文化面貌,更新认识、追求创新,这是六朝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前提。

**关键词** 六朝 时代特征 文化面貌 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识码** A

近十多年来,围绕着六朝文化的专题探讨与综合研究,取得了堪称丰硕的成果。仅以六朝都城所在的江苏为例,2001年出版了近80万字的《六朝文化》(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而2002年至今,南京出版社组织的“六朝文化丛书”已经推出了12种,约400余万言。以下略谈笔者的一些浅见,以备读者诸君的参考与批评。

## 一 为什么是“六朝”?

从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前后300多年间,在中国内地农耕社会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权,如曹魏、蜀汉、孙吴、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宋、齐、梁、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些政权,总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若以曹魏代表三国,又称为魏晋南北朝。其中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绝大部分时间都以建业、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为首都<sup>[2]</sup>,合称六朝<sup>[3]</sup>;换言之,六朝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定都于建业、建康,疆域约以秦岭、汉水(中游)、淮河一线以南地区为主,时间基本连续的六个南方王朝。

然而,如此定义“六朝”,并非没有异说。如以时代论,或称六朝“是三世纪初至六世纪末前后三百余年的历史时期的泛称”<sup>[4]</sup>,日本学者六朝概念的运用大都如此<sup>[5]</sup>,国内学人也有这样混用的;又以朝代论,也还有北方六朝说,即把曹魏、西晋、北魏、北齐、北周、隋称为六朝,这比较多地用在旧时的文学史上。按时代意义上的“六朝”概念,毕竟与

习用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或“魏晋南北朝”概念混淆;而北方六朝说更欠妥当:不仅国都不一致、时间不连续,而且性质也不同(曹魏、西晋、隋皇族为汉人,北齐为鲜卑化的汉人,北魏、北周为鲜卑拓跋部、宇文部;又西晋、隋为统一时期,其它则为分裂时期)。

问题在于,南方六朝说所包含的六个朝代,时间上也是不连续的,即以西晋统一为界,分成了孙吴与东晋、宋、齐、梁、陈前后两段。在学术史上,东晋、宋、齐、梁、陈就有“五朝”的称法,如章炳麟有《五朝法律索引》(1908年)、《五朝学》(1910年),王伊同有《五朝门第》(1943年)。那么,为什么又将此六个王朝习称为“六朝”呢?其中的关键,当在六朝的一贯性相共通。

首先,从时间上看,南方六朝算是一个基本连续的单元,这又有两层意思。其一,按照传统史学纪年,《四库全书总目》《建康实录》条称“起吴大帝迄陈后主”。吴大帝孙权229年称帝,而始建黄武年号为222年,陈后主陈叔宝被俘于589年,中间则属灭吴后作为统一皇朝的西晋纪年的37年(280~316年)<sup>[6]</sup>;其二,如果把六朝史理解为相对独立的南方区域史,则六朝的上限可以提前到195年或174年。195年孙权长兄孙策过江,这是孙策割据江东、奠定孙氏基业的开始,孙策过江所率武装,中坚又是其父孙坚旧部,孙坚势力的形成,是174年“坚以(吴)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

收稿日期 2008-12-08

作者简介 胡阿祥(1963~),男,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人<sup>[7]</sup>。如此,六朝史上的第一位皇帝、同时也是吴国开国之君与守业之主的孙权,其事业乃是近承孙策、远承孙坚的。同样的道理,六朝后半段即东晋南朝史也可以从317年提前至307年,正是在这一年,司马睿南渡,从而开南方的东晋南朝局面。然则按照上述的理解,延续400年左右的南方六朝史中,仅有不到30年的时间为统一的西晋,所以六朝在时间上还是基本连续的单元。

其次,六朝后半段即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之间,在许多方面一以贯之,保持着明显的共通性。比如首都相同,疆域虽有变动,但总以秦岭、汉水(中游)、淮河以南地区为主;享国时间都不算长,其更迭皆出于禅让,国号虽改,国家性质不变;又当时社会风气孝重于忠,以致前朝之贵戚,可能即后朝之功臣。人物、阶级的一系相承,复使政策、制度陈陈相因,政治、文化息息相通,即便经济与 社会的发展,也如同一个朝代。

再次,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点,西晋的短暂统一并未打破孙吴故地独立发展的步伐,也没有中断六朝前后两段之间的诸多联系。孙吴与所谓五朝除了外部对立力量不同(吴与汉、魏三分,是军阀混战的结果;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对峙,则是因非汉族立国中原而被迫退守)外,其它诸多方面仍是一以贯之,具有着多样的同一性。比如孙吴确立的“限江自保”政策,即以建业为中心,以扬州为根本,以日益发展的南方经济为基础,以南方土著豪族与北方南迁大姓的协力为依托,凭借地理上的山河之险,层层防御,从而与北方相对抗,这样的基本守国政策,为东晋南朝所继承;又作为第一个确具规模、立国于江南的汉族国家,孙吴对江南所作的普遍而又深入的播殖,孙吴对蛮越的开发,实为东晋及其后的南朝立国江南的契机;孙吴的开疆拓土,则为东晋南朝的疆域打下了基础,东晋南朝疆域的主体部分,正是“北据江,南尽海”<sup>[8]</sup>的孙吴旧壤;孙吴以荆州为军事重地,以扬州为财赋要区,即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分立,政治中心与经济区域重合,这样的立国形势,东晋南朝时并无大的改变。要之,孙吴一代其实已经奠定了六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南北对立时期南方政权的立国方针与疆域规模。所以,孙吴一代是值得特别重视的<sup>[9]</sup>。又笔者曾经撰文<sup>[10]</sup>,论证偏安的东晋虽然名义上仍是晋朝,衣冠礼乐或则取之,就国家基础的实质论,却是隔代继承了30多年前被晋朝灭亡的孙吴,而区别于建都洛阳的统一皇朝西晋;孙吴与陈朝,且皆为“完全南方色彩的朝代”。这样,“东晋复

活吴国及六朝首尾吴、陈两朝性质的一致,更进一步显示出六朝的一以贯之,或曰历史的共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视六朝为一个时间单位,作为一个研究单元。”

## 二 时代特征与文化面貌

六朝史既是相对独立的南方区域史,六朝又毕竟是魏晋南北朝的组成部分,六朝文化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理解六朝文化尤其是广义的六朝文化<sup>[11]</sup>,离不开对时代特征的整体把握,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视野狭隘、立论偏颇、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式的“研究”。从比较与宏观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有以下时代特征:

其一,深层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有21年(280~301年),即便是这21年,西晋也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版图:鲜卑基本已据有匈奴旧地,并日益南下;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已为羌胡所占;内徙的匈奴人实际上已控制了今山西的北部。西晋以前,有三国的鼎立;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而黄河流域更是始终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政权,甚至同时有十多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各别区域的经济、文化、学术、政治乃至心理,也逐渐“区域”色彩浓厚;“区域”独立趋势加强。区域意识的强化与区域传统的生成,也是一种“分裂”。又即便在同一政权内部,也有着明显的地区军事割据倾向,如东晋南朝的地方州镇,北朝的镇戍,这既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争衡、内外的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局面下的地区割据与对抗倾向。

其二,复杂的民族关系。四周的边疆民族南下北上、东进西入,迁徙频繁,造成民族成份复杂,民族融合(自然的融合与强制的融合即战争)加速,民族战争剧烈,民族更替迅速。北方地区的主角是入主的“五胡”与留居的汉族,在北方整体“胡化”的同时,是颇多艰难曲折的胡人的逐渐“汉化”;在南方,则特别表现为退守南方的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以及越蛮俚僚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这也是一种“汉化”。如果再考虑到周边特别是蒙古高原、东北、西域的民族,则魏晋南北朝历史实际是由北方边疆民族(重要者先后有鲜卑、羌胡、高句丽、柔然、高车、突厥等)中原地区(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南方六朝三大地域所构成的。其间区域对抗、民族兴衰、社会转型、制度冲突、文化融汇等等,异常复杂。

其三 频繁的人口迁移。这特别表现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当时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sup>[12]</sup>。即以大量人口的迁入东晋南朝境内所产生的影响为例:首先,从实质上讲,东晋南朝特别是其中的东晋、宋、齐、梁,是移民政权,其皇统无一不在北方。而统计《南史》列传人物,不计后妃、宗室、孝义等传,则728人中原籍北方者506人,南方籍者222人<sup>[13]</sup>。正是北方移民与南方土著的结合,造就了东晋南朝的局面。其次,极大地丰富了南方文化的内涵,迅速地提升了南方文化的层次。如由于侨旧杂处,语言混同,进而导致方言区的变化,今南京、镇江等地,正是在优势的侨人文化的作用下,告别了吴语,逐渐转变为间杂吴语的北方语言。又如饮食方面,北人习惯面食,为了解决这一需求,南移的北方人惟有就地种植,于是南朝以降,小麦成为南方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又就精神文化言,南迁移民中众多的宗室官僚、世家大族、文人学者,他们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水平,势必对迁入地的文化成长发生持久的作用,使得南方的文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园林以及思想等等,面貌出新。再次,有力地甚至超常地促进了诸多相关区域的经济开发。比如晋陵郡境,东晋以前尚属地广人稀、田多恶秽之地,及至南朝,已经号称“大郡”,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这实赖南徐州境内的侨流辐辏。另外,大量北人南迁,需要了解、认识新的南方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这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各类地方志书与异物志、风土记等等的迅猛涌现;反之,南方土著因为受到大量高层次的南迁北人之政治与文化优越感的刺激,其区域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于是通过地方志书,表彰本土的历史传统、文明教化、古圣先贤、人物俊哲、风俗物产甚至自然山水,也成了他们维护区域尊严、增强群体观念的手段。又在文学上,新的环境意味着新的刺激,东晋刘宋时代兴起、而由南迁北人及其后裔为主要创作队伍的山水文学,与此有着一定的联系。至于因安置迁来人口而设置的侨州郡县,则造成了南方政区的混乱,为了解决这种混乱而实行的土断政策,又使得侨寓南方的北方人转变了身份,成为南方人。要之,正如谭其骧师《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文中所说,东晋南朝时期的人口南迁,“为吾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之一大关键”,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

也”。

其四 特殊的社会结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宗法封建性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按照家族系统分配政治、经济权利而出现的门阀政治,由于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剧烈运动而造成的动荡、对峙、分裂局面,使得这一时期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个特征尤为强烈与明显。其中,以宗法性与等级性为内核的门阀世族成为统治阶层。西晋以至东晋,门阀世族的统治不断强化;及南朝以降,门阀世族的政治地位虽有所下落,社会地位仍很巩固。与此相联系,该时期世族寒门界限森严,而随着世族的衰落,寒门地位逐渐上升,南朝帝王大抵出身二等乃至寒门军功地主就是明证<sup>[14]</sup>。

其五 变动的典章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上每多权宜之制,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缺乏凝固的制度,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地发生着流变;也正因为这是制度上的过渡时代,各种制度显得尤为复杂。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表明,汉制与唐制有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由魏晋南北朝400年左右的自然演变所致。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当然不止以上五点。比如在经济上,南方六朝加速开发,这首先表现在长江下游,并向西(长江中游)向南(岭南)推进;在生产关系上,北方十六国北朝封建制与奴隶制残余相结合,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当时有各种名目的依附者。

上述种种时代特征,都或显或隐地给予六朝文化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那么,在这些影响下,六朝文化有着怎样的面貌、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以言面貌,仅就狭义文化看,这是区别于统一时代颇多禁锢的人性觉醒的时代,是没有思想权威的时代,多元文化显得是那样地生动活泼,其兼容发展、自由争辩的文化发展模式,其对外来文化吸收、融合的成功范例,使得六朝堪称是春秋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西汉武帝以来与统一国家相配合的、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儒玄佛道四家并立,而且在相互影响,有的人儒玄双修,有的人调和儒佛。就儒学言,虽然儒学不再有两汉的盛况与“独尊”地位,儒家的政治观念、道德说教、人生理想,依然是维系国家政教传统的核心准则,也是当时世族仍在传承的内在命脉。以玄学言,玄学是援道入儒,以老、庄、易三玄解经,盛行于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新的



学术思潮,玄学清谈成为时尚;以佛、道言,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并且佛教在这一时期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道教在这一时期则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又这一时期文学地位在不断上扬,以垂训鉴戒为基本特征的史学也受到普遍重视,而内容庞杂、往往未易驾驭的诸子地位下降。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演变过程中,六朝是对原有文化继承与开拓的时期,是文化上呈现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个性化、率真化的时期,是独具特色的重要时期。

至于六朝文化取得的成就,卞孝萱师着眼思想文化的演变指出:“西晋末年,黄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并有极大的发展。就文学艺术说,西晋以前,不离古拙的作风;自东晋起,进入新巧的境界。就经学、哲学、宗教说,西晋以前,不离拘执不开展的作风;自东晋起,无拘执地开展了起来。在玄学和佛、道思想大肆传播的同时,唯物主义思想也在发展,并与唯心主义思想进行辩论”<sup>[15]</sup>;又韩国磐先生《略言六朝之盛》<sup>[16]</sup>曾有这样的概括:“述文事则二陆为吴郡之英,陶谢乃晋宋之杰,沈范则领袖风骚,徐庾则专擅文彩。四声八病,始发明于江左;文选文心,均载誉于千年。至于书尊逸少,画赞虎头,咸称绝作,雄踞艺苑。若乃天文地理,历法术数,皆有创造,超迈前人。勾股有方,割圆有术,钢经百炼,船名千里,超越江海,窥测日月,精思妙艺,层出不穷。”

面对如此丰富而又如此杰出的六朝文化,我们该以怎样的方法与态度进行研讨呢?卞孝萱师指出:“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非打通中土与异域的界限不可,非贯连当代与前后的关系不可;研究这个时代的文化人,必须文史哲融汇贯通,举凡时代背景、学术氛围、家世门风、师承流派,以及有关研究对象的全部著作及资料,都应该全盘把握。当然,达到这个境界是不容易的,而惟有达到了这个境界,才能饶有发明,多有所获,其研究才能真正地胜任愉快”<sup>[17]</sup>;韩国磐先生也作出了如下的提示:“六朝固为纷扰多事之秋,亦饶繁盛发明之迹。面首狎客,未可全斥以荒淫;鹄飞鹏举,还宜深探其经略;去其糟粕,而钻研典册之闾奥,取其精华,以光大炎黄之文明。”<sup>[18]</sup>

### 三 更新认识与追求创新

诚如韩国磐先生之言:“纷扰多事”的六朝,同时也是文化的“繁盛发明”时代;其实六朝的地位,又不仅表现在文化方面。进而论之,魏晋南北朝是分裂时代,六朝是偏安政权,这都是没有疑问的,

但必须强调的是,分裂不等于反动,偏安不等于无为。这是关涉中国历史与六朝评价的大问题。在社会财富的投向与使用、行政效率、地区开发、思想文化、保持“汉统”等方面,分裂时代、偏安政权的地位与贡献是不容抹杀的<sup>[19]</sup>。具体到六朝,也是如此。六朝在政局上相对于北方要稳定一些,六朝在经济上取得了明显进步,六朝在民族融合上成效显著,六朝与北方以及海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相当频繁、活跃,在思想文化方面,六朝更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活跃、学派蜂起、文化繁富的时代,给后世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我们不能简单地、表面地仅仅把六朝认作分裂割据、偏安短促的皇朝,而对其采取轻视的态度。六朝政局是分裂的,但在分裂中孕育着未来的统一,六朝政权是割据的,但在割据中传承着先进的文明;六朝政治上是偏安的,但偏安维护了南方的稳定,为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我们应当看到,在五胡十六国大乱时期,正是由于司马睿、王导君臣在南方重建晋朝,及以后宋、齐、梁、陈较为平稳的递嬗,才使先进的传统文明在南方得以保存与延续,才没有被相对落后、野蛮且具强大破坏力的胡兵毁于一旦<sup>[20]</sup>。进一步说,保存、延续于南方的先进的传统文明,也给十六国北朝的统治者逐渐接受这种文明提供了机会与条件。范文澜先生说:“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政治上是偏安,轻视它们的贡献。”<sup>[21]</sup>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研究六朝历史与文化,更新我们的认识,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世家大族的评价问题。什么是世家大族?《新唐书·高俭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然而在特别重视阶级分析的时代,世家大族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据二十世纪50年代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周勋初先生回忆:“学习文学史而进入魏晋南北朝阶段,犹如进入黑暗时期一样。老师讲到左思《咏史诗》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几句时,总要对这种社会现象大加批判,同学听后也无不义愤填膺。王谢高门,最易遭到挞伐。高等院校中每次搞大批判,常把谢灵运拉出来痛骂一顿,什么生活腐朽,作品形式主义严重等等,当时的古代文学论文中常见这种论调。”<sup>[22]</sup>然而按照这样的观点来

理解六朝历史与文化,便觉格格不入了。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中,六朝应该是最具贵族气质的时代了。在这个时代,把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的是世家大族,拥有连片大地产的是世家大族,撑起这一时代文化大厦的也是世家大族。这是一个世家大族起决定性历史作用的时代,是世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时代;“魏晋南北朝社会中的许多贡献是由门阀贵族中人作出的”<sup>[23]</sup>。如果全盘否定世家大族的作用、地位、影响,还谈什么六朝历史与文化呢?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六朝文化的研究,关键就在家族,这有几点意思:其一,治六朝文化必须由家族入手;其二,家族与地域不可分离,家族都基于特定的地域之上;其三,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优美的门风(家风)与因袭的学业(家学);其四,家族的家风与家学关系着、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社会。

更新认识,是为了客观地研究六朝文化及六朝文化中人,是为了推进六朝文化研究的创新。而所谓创新,又建立在正视存在问题、避免追捧热点、明确努力方向的基础之上<sup>[24]</sup>。

六朝文化的研究,当前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在缺口多的同时,“热点”的重复现象严重,如世族文化的研究,往往重复做个案,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侨姓,吴郡顾、陆等吴姓,论著很多,但较少新的角度,缺乏新的资料;六朝文学的研究,也存在重复现象,这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诗品》、《文心雕龙》的研究中。而另一方面,六朝文化研究有待努力的方向却很多。诸如六朝宗教信仰与科学技术,六朝南北交流与中外交流,六朝民族状况与民族文化,六朝人口迁移与文化演变,六朝考古发现及其文化解释,等等,都还研究得很不充分,而又亟待深入的探讨。

六朝文化是有历史特点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它承上启下、继汉开唐,继承发展了秦汉文化,并孕育了空前繁荣昌盛的隋唐文化。陈寅恪先生指出:六朝文化在传承汉魏以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成为隋唐礼乐政刑典章制度的重要渊源<sup>[25]</sup>;国外学者把包括六朝在内的汉晋文化与罗马文化并列为世界古代文明的两大中心,这又说明了六朝文化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六朝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是可以肯定的:六朝在中国南方开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南京作为六朝的首都,江苏苏南作为六朝的王畿区,秦岭、汉水(中游)淮河以南作为六朝较稳定的疆域范围,六朝文化的探讨,对于该区域弘扬历史文化传

统,进行新的文化创造,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六朝文化研究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而目前的研究,距离学术与现实的要求还差之较远。从全国现有研究六朝文化的论著看,上层的雅文化占大多数,下层的俗文化相对要少得多。在雅文化中,又以文学占大多数。在文学论著方面,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状况,如对六朝文学的研究与对六朝文论的研究不平衡,《文心雕龙》的研究非常活跃,《文选》的研究相形见绌;诸种文体的研究不平衡,研究诗的成果多,研究骈文的成果少,作家的研究不平衡,陶渊明的研究者最多,嵇康、陆机、陆云、鲍照、江淹、沈约、庾信的研究者较少。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也存在于史学、哲学等领域中。总之,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圆满地反映出六朝文化的全貌。

针对这种状况,当前开展六朝文化研究,应该开拓新的专题,运用新的材料,提出新的观点,展示新的风格。在研究方法上,分门别类地理清思想、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宗教、风俗等各方面的具体史实与发展线索,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更应强调的是:在时间上,把六朝文化与此前的秦汉文化、此后的隋唐文化进行比较,以明了其纵向的流变;在空间上,把六朝文化与同时期的北方文化进行比较,以探究其地域的差异。在层次上,上层的雅文化即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文化,值得深入研讨;下层的俗文化——包括民众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因其丰富多彩,而构成为当时社会文化景观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六朝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门。研究六朝文化,还应避免轻重失衡,仅仅重视精神文化的研究是不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都要顾到。至于六朝文化精神(即六朝文化的精髓所在),六朝文化建设(如图书、目录、官学设施、各级文化机构等),六朝士人风貌(如服药、行散、饮酒、冶游等),六朝文化内部的时代变迁(如孙吴之尚武,不同于齐、梁之尚文),区域差异(如淮域不同于江东,江东不同于江汉,江汉有异于巴蜀,巴蜀有异于岭南),民族特征,各别文化因子的交互影响(如佛道与文学之间),北人南迁、南人北流所带来的南北文化由冲突到融汇,六朝文化遗存及其开发利用,等等,也都是六朝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上所议,在六朝文化研究中,明确时代特征与文化面貌,是为了做到胸有成竹,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是为了保证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进

行更加到位的个案探讨,更新认识与追求创新,则是为了不说套话、不说没有水平的话。进而论之,拓宽加深六朝文化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熟悉基本文献资料,利用文物考古资料,把握相关理论与学说,并且妥善处理“致知”与“致用”的关系,也是值得重视的几个方面。纸短话长,另文详之。

- [1]如这两年来,围绕齐梁帝王故里在常州武进还是在镇江丹阳,引发了参与度极为广泛、言辞异常激烈、乃至往往溢出正常学术讨论范围的争执。这种社会现象,颇是引人深思。
- [2]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自京(今江苏镇江市)徙治秣陵(今江苏南京市),次年改名建业。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复改名秣陵。太康三年分淮水(今称秦淮河)南为秣陵,北为建业,并改“业”为“鄆”。建兴元年(313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又221~229年,265~267年,孙吴曾两次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市),552~554年,梁元帝又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六朝其它时期,则皆都于建业、建康。
- [3]如《宋史·张守节》说:“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南宋张敦颐撰《六朝事迹编类》,叙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建康古迹。
- [4]《辞海》(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 [5][日]山根幸夫主编,田人隆等译《中国史研究入门》(增订本)第三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 [6]西晋纪年开始于265年,及280年灭吴,结束分裂局面。
- [7]《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资治通鉴》卷五七系此事于熹平三年(174年)。
- [8]杜佑《通典·州郡典一》。
- [9]按: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未予孙吴以足够的重视。即以三国史研究为例。传统史学就过分抬高蜀汉,以魏汉对峙

为主线。其实三国鼎立,蜀汉只是一个小伙伴而已。

- [10]胡阿祥:《关于六朝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 [11]这里广义的六朝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其内涵与外延比单纯的精神文化要丰富得多。
- [12]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第三篇“东晋南朝侨流人口专题”、“余论: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开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 [13]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
- [14]关于特殊的社会结构问题,可参阅简修炜、高永清《论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 [15][17][24]卞孝萱:《关于六朝研究的几点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 [16]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六朝史论集》,黄山书社1993年。
- [18]韩国磐:《略言六朝之盛》。
- [19]葛剑雄:《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 [20]如《梁书·张缵传》载张缵之《南征赋》称颂东晋始主元帝司马睿之开创五朝局面曰:“启中兴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观其内招人望,外攘干纪,草创江南,缔构基址。岂徒能布其德,主晋有祀。《云汉》作诗,《斯干》见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兹四代,多历年所,二百余载。割疆场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繄明德其是贲。”
- [21]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五章“简短的结论”,人民出版社1978年。
- [22][23]周勋初:《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2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

## Some Opinions on Research of the Six Dynasties Culture

HU A-xia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The Six Dynasties are always taken as a whole for research because of their consistence and persistence. Nowadays, the research, exploi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ulture in the Six Dynasti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supports and concerns from scholars, government and society respectively. It even arouses disputes for cultural resource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So from a macro point of view, we should clarify relative concepts, specify the time character and culture visage, update recognition and pursue innovation in order to deepen the study of Six Dynasties culture.

Key words: Six Dynasties; time character; culture visage; existing problems